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 VOL.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转型 与新兴国家

高奇琦 主编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 VOL.1

全球治理转型 与新兴国家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GLOBAL GOVERNANCE

高奇琦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治理转型与新兴国家/高奇琦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

ISBN 978-7-208-13809-4

I. ①全… II. ①高… III. ①国际政治-文集 IV.
①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8545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夏 芳

全球治理转型与新兴国家

高奇琦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4 字数 267,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09-4/D·2867

定价 48.00 元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
查尔斯·拉金	加利福尼亚大学爱尔文分校
冈特·舒伯特	德国图宾根大学
林尚立	复旦大学
庞中英	中山大学
桑玉成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谭君久	武汉大学
吴志成	南开大学
肖逸夫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
俞可平	北京大学
张小劲	清华大学
钟杨	上海交通大学

主编：高奇琦

执行主编：严行健

编辑部成员：

阙天舒 王金良 汪仕凯 章远 吉磊 游腾飞 郝诗楠 朱剑 杜欢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第一辑序言

高奇琦

如果说以往的国家可以通过闭关锁国而“独善其身”，那么在今天随着各类国际公共问题甚至是公共领域的形成，不论哪个国家都很难不与全球治理过程发生联系。然而，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并非理所当然，它仰赖于国家间的“求同存异”，而“求同存异”的前提就是理解各个国家之间的异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较政治的研究可以为全球治理的推进提供知识基础。

这就是这本集刊得名的简要原因，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近年来所确定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们希望通过将两者的研究结合，为知识界和实务界提供有益的观点与成果，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本辑《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的主题是“全球治理转型与新兴国家”，主要关注的是两方面内容：一是全球治理机制所遭遇的现实挑战以及可能的变革；二是探讨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于全球治理的诸种意义。

全球公共治理如今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因此对于治理方式甚至是治理机制变革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庞中英等人的文章探讨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对于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他指出这种贡献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运用中国的实证经验来改进西方的理论；二是发展以中国为基础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刘锦前的文章关注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的角色。他从“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共情”(即充分理解对方)环境构建的可能性与方法，而这对于中国目前正在主推的“一带一路”战略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王明国的文章分析了联合国目前在有效性方面所存在的困境。他认为，联合国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可以表现为治理主体间的挑战、治理理念的挑战以及治理客体的挑战三个方面；与此同时，作为因应的方法，他指出联合国不仅应进行原有制度模式的改革，还应建设应对新挑战的制度。王铁军的文章则意在探究全球社会治理体制变迁动力的问题，他认为体制变迁的动力来自施动者，但是从本质上来

说施动者又并非铁板一块,它可以分为首动者与从动者,而这两类施动者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决定了全球社会治理体制的变迁与稳定。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施动者的策略并不能百分百地实现,它需要受到场域及其动态复杂性以及策略本身局限性的制约。

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全球治理领域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根据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近两年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的得分与排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参与方面的比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新兴国家的这种崛起必定会推动全球治理的新变革。本辑就这个议题选取了几篇文献,其中包括了西方学人发表的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论文。比如肖逸夫及其合作者就以东亚国家为例,讨论了新兴国家融入二十国集团对后者的影响。与之相似,斯里尼瓦萨·马度尔的文章也讨论了亚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日益增长的能力以及优势;而安·弗洛里妮则讨论了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是如何总结和展望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的。当然,新兴国家不仅仅存在于亚洲,还有拉美和非洲。祝鸣的文章便对南非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阿姆里塔·纳利卡和马修·D.斯蒂芬的文章都以金砖五国为研究对象。前者探讨了金砖五国的发展对全球贸易治理改革和发展的意义,后者则梳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原有基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全球治理格局的挑战。安娜·弗拉·巴罗斯-普兰提的文章以巴西为例,展示了新兴国家在某些全球治理机制中所扮演角色的局限性。除此之外,本辑还专门选取了四篇有关中国的专论,集中讨论了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应担负的责任。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治理的研究方兴未艾。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当下,其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亦自不待言。我们希望《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在将来能够成为中文学界讨论相关问题的一块园地,我们也愿意为这块园地付出自己的努力。

目录

1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第一辑序言	高奇琦
【全球公共治理的困境与转型】		
3	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论缺失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庞中英 王红缨
28	“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共情”环境构建析论	刘锦前
44	联合国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困境与未来发展	王明国
55	全球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及其限度	王铁军
【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		
71	二十国集团中的发达和新兴大国：以东亚为例	肖逸夫 尼尔·度甘
90	亚洲在 21 世纪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斯里尼瓦萨·马度尔著 王国伟编译
104	新兴大国与全球发展议程：基于南非参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分析	祝 鸣
120	新兴亚洲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改变	安·弗洛里妮著 张瑞丹编译
129	全球贸易治理中新力量的挑战	阿姆里塔·纳利卡著 张佳威编译
140	新兴大国、全球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金砖国家的挑战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马修·D.斯蒂芬著 张晨阳编译

- 158 新兴国家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以卢拉执政时期的巴西为例

安娜·弗拉·巴罗斯-普兰提著 王子帅编译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转型】

- 175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蔡拓教授访谈 蔡拓 王金良

- 186 中国作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一个案例——兼论中国官方对待

“全球治理”的态度转变

庞中英

- 200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的“再社会化”

郝诗楠

- 217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及现状分析

曹亚斌

【会议综述】

- 231 “国家治理指数研究与评估”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任海燕

- 234 迈向坚实的世界政治——“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学术

研讨会会议综述

蔡鑫

【简讯】

- 245 《全球治理指数 2015 年报告》发布

郝诗楠

- 250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第三辑主题论文约稿启事

全球公共治理的困境与转型

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

——论缺失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庞中英 王红缨**

【内容提要】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IPE)中创建秩序、稳定以及正义,对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便是这一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日渐增强,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将促使这一领域产生独特的“中国”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反映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中国丰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但是通过考察中国的学术研究,我们发现,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一领域中未生产出新的知识,更未提出新的理论。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包括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在中国仍然处于西方学术社会化的深刻影响之下;第二,中国的制度环境限制了那种能够提出新的见解以及创新观点的学术研究。我们还探讨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如何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积极演进和发展,以及可能阻止这种发展的障碍。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制度 全球治理 中国学派 知识生产

* 原文载于:“Deb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Missing Chinese IPE Contribu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0, issue 6 (December 2013)。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李静翻译。

** 庞中英,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王红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创建秩序、稳定以及正义,对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便是这一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日渐增强,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将促使这一领域产生独特的“中国”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反映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中国丰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事实上,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在广泛地呼吁创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中国不仅要生产物质资料,更要生产观念和知识。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并提倡减少对西方知识的复制,增加本国的知识生产(Zou 2003; Tang 2010)。正如复旦大学一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所强调的那样,由于中国正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已经逐渐减少对核心国家的依赖,这也包括克服在知识生产上的依赖性(Song 2011)。

然而,事实却与这些期望大相径庭,这一点会在我们的文章中得到证明。通过考察关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包括中国主要的学术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文章、数本核心著作以及一些支流学说,我们发现中国学者并未发展出新的知识,更未提出有突破性的理论观点。

尽管中国拥有与众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并且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为何依旧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贯穿本文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智力难题。我们认为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包括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在中国仍然处于西方学术社会化的深刻影响之下;第二,中国的制度环境限制了那种能够提出新的见解以及创新观点的学术研究。

本文的第一部分在对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中勾勒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轮廓。第二部分简要地把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和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加以比较,从而确定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探究为何中国的学术研究未能对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作出重大贡献。第四部分讨论中国的学术研究如何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未来全球范围内的演进和发展,以及可能阻止这种发展的障碍。

一、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演进中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从传统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并不重视国际制度的研究,而是把这个

课题留给了国际法研究。但是,这一点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而得到改变。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汇率危机和石油危机之后,决策者以及学者均意识到全球问题需要政策协调,而政策协调需要制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制度的研究开始兴起。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从制度经济学中得到了启发,重点研究国际制度在减轻交易费用和促进处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间合作中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书籍包括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1983 年)和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1984 年)。自此以后,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迅速发展,并且变得更加复杂。

全球治理指的是一系列制度与管理世界上的事务如何发生的进程的综合体,它是一个比国际制度更加宽泛的全新概念,重点突出世界上诸多紧迫问题的全球维度,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相互依存、移民、金融危机、毒品走私、环境恶化以及各种流行疾病等。尽管各类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继续履行重要的职责,全球治理却强调诸如多国公司、跨国行为体网络和社会运动等非国家实体,并认为这些非国家实体已经成为提出要求、制定目标、发布指令和执行政策的重要行为体,借此方式世界便可得到管理。全球治理领域中开拓性的著作有詹姆斯·罗西瑙和切皮尔(E. O. Czempiel)所著的《没有统治的治理》(1992 年)以及戴维·赫尔德等人所著的《全球转变》(1999 年)等书。尽管世界政府这一概念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全球治理却在近些年中流行起来。

在中国,国际制度研究和全球治理研究密切相连,但却不尽相同,二者都不仅仅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国际制度的研究者不仅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而且包括国际安全和一般国际关系理论(IR)的研究者。全球治理主要是由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进行研究,但是它更多地吸引了来自经济学家以及全球化和比较政治体系的学者的注意力。

复旦大学的苏长和教授在回顾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制度性视角后指出,对于一般性制度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便开始流行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的结果(Su 2006)。中国经济学家翻译了诸如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奥利弗·威廉姆森等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的作品,并运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中国学者把制度理论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根据苏长和的观点,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在 1992 年所著的一本关于战争和道德的书中首次将“国际机制”这一概念引入中国(Ni 1992)。在此之后,时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逸舟在 2005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进一步解释了国际机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

作用(Wang 1995a)。

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最早讨论出现在王逸舟于1995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一篇报告(Wang 1995b)。在全球治理这一概念上,中国的话语大量地借鉴了西方的学术著作和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报道和宣言中的内容,这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中共中央编译局一直积极地翻译和编辑来自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关于全球化及其问题的著作,局长俞可平主编了一本名为《全球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著作,该书收录了国外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众多文章(Yu 2003)。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学者开始对加拿大学术界所讨论的关于全球化与自治(例如 Pauly and Coleman 2008)以及全球经济中的新兴大国等问题充满兴趣(例如 Cooper and Antiewicz 2008)。

在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中有三个问题极大地吸引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注意力。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是否重要。该问题的争论双方,一方是新制度主义者,他们对此持肯定态度;而另一方是现实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国际制度只是国家间实力分配以及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反映。第二个问题是制度安排将会增强还是减弱国际制度和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的作用,这主要是自由主义范式内关于制度设计的争论。第三个问题与国际制度以及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相关。现实主义者主要关注它们对国家主权的潜在威胁。批评理论家,包括那些从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人,对此持批判态度,因为它们未能解决不平等和剥削。那么,中国学者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首先,国际制度是否重要?在上面提到的文献综述中,苏长和教授注意到,对国际制度做了长期研究的中国学者承认国际制度具有独立性,国际制度与国家实力以及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分开的(Su, 2006)。联合国(UN)是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研究文献中的一个主要题材。总的来说,中国学者积极肯定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促进发展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解决其需求的平台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 Zhang 1995; Fang 1995; Han 1995)。除了联合国之外,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还重点关注地区性国际制度,尤其是亚太地区制度。他们普遍赞同地区化是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并认为地区化能够维护国际和平,加快经济合作,促进经济繁荣,推动多极化世界的形成(例如 Huang 1992; Gao and Lu 1994; Liu 2004)。这一类型的学者通常大量地借鉴

了美国学者关于国际制度的观点。

但是上述自由主义观点并没有垄断中国学术界对于国际制度的看法。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一派来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他们拒绝承认国际制度改变了权力政治的本质这一假设(例如 Nie 1989)。甚至在那些普遍认为国际制度是重要的行为体的学者中,一些人强调国际制度最终是被最强大的国家所控制,并服务于其谋求自身国家利益这一目的(Jian and Ding 2002)。他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是一个霸权国家,它只采纳并遵守那些能够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而对那些违背其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美国便会弃之不用(Men 2001)。一些“全球公共物品”实际上是美国独家占有的(Fan 2008, 2010; Guo 2010)。

另一派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评来自批判理论。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系统地采纳了批判理论中关于国际制度的观点,其中的一些人具有新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例如,南京大学的李斌撰写了大量基于新葛兰西主义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尤其是关于罗伯特·考克斯的学术著作(Li 2000, 2003, 2005b, 2007)。通过分析构成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基础的权力结构,李斌认为诸如三边委员会、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是超级结构的一部分,是以全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它们使用了诸如“相互依存”、“全球化”、“竞争”和“现代化”等概念来表现它们的意识形态,并以牺牲边缘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服务于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国家。中国融入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后,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谋求独立发展(Li 2010)。

第二,何种制度安排会增强抑或减弱国际制度和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的作用?一些中国学者从一般理论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借鉴了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尤其是与理性选择理论相关的方法(例如 Tian 2002a, 2002b; Qu 2010)。

更多的中国学者集中关注何种制度安排会增强抑或减弱亚太地区制度的作用,在部分程度上这是由对全球制度的普遍不满而引起的。举例来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中国学者以及其他亚洲学者抱怨全球金融制度在处理不稳定的全球化经济上并未产生任何效果。他们认为在缺乏有效的全球金融管理机制的条件下,中国和它的亚洲邻居需要携手处理全球问题(Pang 2001; Su, H. 2006)。

中国学者经常把亚太地区同欧洲进行比较。他们认为亚太地区有着独特

的、与欧洲大相径庭的经济、战略和文化环境,这一地区在经济上呈现多样性。亚太地区的两个主要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历史的敌意和现行的竞争而充满变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比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牢固。此外,该地区在文化上偏爱非正式的网络框架而不是正式的组织。因而,与欧洲的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太地区的制度缺乏基于政府间合作的核心框架,这些制度可以分为几个交叉重叠但却并非高度制度化的组群,即正式的制度与非正式的制度,基于政府间协定的制度与基于经济上互补而形成的制度(例如 Pang 2002; Chen and Chen 2006; Pan 2006)。

撰写这个主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具有以政策为导向的倾向,他们有时会引用西方关于地区主义的学术著作,但是很快又会转向描述在亚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如何在地区制度中寻求自身的定位。有一小部分中国学者以理论为导向,他们意识到欧洲范式在有关地区制度的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引入亚洲经验来丰富对地区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的王正毅教授指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在地区制度的发展中起了领导作用——也就是所谓的“东盟道路”,这表明存在着超越基于欧洲模式和理论的地区化的可能性(Wang 2003)。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和魏玲教授指出,东亚的地区合作偏离了现存的地区化理论:它是一个进程,但却没有蓝图来引领最终的发展结果,该地区的主要大国在参与由小国发起的各个进程中熟悉了地区制度。这种以进程为导向的模式定会丰富地区主义的理论(Qin and Wei 2007)。

第三,国际制度合法吗?在这一点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国际制度的批判不绝于耳。一些批评基于对国家主权和自治的关注。例如,他们批评联合国日渐增多的干涉行动,其中包括维和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趋势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并且可能被强势国家(尤其是美国)用来谋取本国的私利(Zhou 1994; Gu 1994; Yin 1995; Li, D. 2000, 2004; Tang 2001; Zhang 2001)。

另一类批评突出许多国际制度不民主的本质。中国学者积极响应西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批评,认为这些组织无法代表世界上小国和弱国的利益以及偏好。在他们看来,这种“民主赤字”削弱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Men 2002; Jian and Ding 2002)。有趣的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中为发展中国家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这让中国学者感到十分自豪(Sun 1992; Zhao 1995)。

中国学者还质疑“善治”的合法性,许多人采取了愤世嫉俗的观点,认为全球治理及其变体,如民主治理和有效治理,不过是装扮为理想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罢了。

了。它们受到国际组织、西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的支持,意在维持西方的霸权(Peng and Liu 2003)。这一命题隐含的意义是西方会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良好的治理,但这需要以后者放弃国家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拒绝嵌入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优越论,坚持认为南方的发展必须来自每个国家自身,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干涉(Tang 1999, 2000; Tang and Zhao 2004)。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已经积极地参与到关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争论中。如同他们的西方同行,中国学者内部时常争论不已。在国际制度的作用、国际制度的设计,以及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等问题上,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视角。总的来说,中国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并非相去甚远。中国学者要么引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要么把自己限制在非理论的政策讨论上,我们并未发现任何新的知识或者理论视角从这个学术群体中脱颖而出。即便在中国学术界极为关注的地区制度和地区治理领域,中国学者也乐意承认他们未能突破欧洲和北美的研究范式(Wang Z., 2003)。

二、独特的中国方法?

截至目前,中国学术界并未在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中生产新知识或者提出新理论,这也不足为怪,毕竟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点将会在后文中详细阐述。一个更加重要而又合适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界是否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如果中国学者运用独特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那么他们的研究迟早会结出硕果,进而丰富全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了精确测定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我们简要地回顾了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献资料。

几年前,随着区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一篇文章和后续专著的出现,本杰明·杰里·科恩开启了一系列跨大西洋的对话(Cohen 2007, 2008),大洋两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迅速加入了这场争论之中(例如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9;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9; Blyth 2009),而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场争论(Zhong and Yang 2010; Bai 2010; Wang 2010)。在关于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争论中,中国学者或隐含或明确地提倡发展一个中国式的——倘若不是一个学派的话——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近在咫尺(Zheng 2008)。事实果真如此吗?